

新农保对双向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研究

阎茂瑶, 纪 杰

(重庆工商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 400067)

[摘要] 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 冲击着中国农村“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模式。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微观数据, 选取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 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 从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两个维度, 考察“新农保”养老金对子女与父母之间代际经济支持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 按照代际经济支持的方向, 代际经济支持可以分为子女向父母(向上)和父母向子女(向下)两种类型的代际经济支持, 且父母与子女的部分个人特征与社会特征会显著影响父母与子女间的代际经济支持。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养老金会对子女经济供养老年父母的行为无显著影响, 但会“挤入”父母对子女(向下)的代际经济支持。

[关键词] 养老金; 代际经济支持; 挤出效应; 挤入效应

[中图分类号] F24 **[文献标识码]** A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中国农村, 以“养儿防老”为核心的家庭养老是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模式。成年子女的转移支付是中国农村老年人老年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相当大比例的老年父母从子女处获得代际转移支付。然而现阶段,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据《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 2017年年末我国总人口数为139008万, 65岁及以上人口为15831万人, 占总人口的11.39%, 较2016年增长5.52个百分点。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总人口比例, 较之国际惯例所认定进入老年社会标准的7%, 高出约4个百分点, 且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约是0~14岁人口增长速度的4倍, 老年人口增长速度不断加快。相对于城镇, 中国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更深, 养老问题更紧迫、严峻。其原因在于: 一方面, 20世纪70年代, 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城市的生育率较农村生育率低, 因此, 农村老年人口基数大; 另一方面, 快速推进的城镇化, 让更多的农村年轻人涌入城市谋求发展, 留守农村的空巢老人和独居老年人逐年增多。

为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提升农村老年人福利水平与生活福祉, 2009年以来, 政府在全国各地农村地区推进“新农保”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并在2012年, 实现了全覆盖的目标。“作为一种外生的因素,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会‘嵌入’到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具体情景并对其产生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农村地区, 以“养儿防老”为核心的“家庭养老”模式是否会受到以“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为基础的“社会养老”模式的影响, 是替代还是补充作用, 这是本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2 文献综述

成海军(2000)、刘国恩(2011)、胡宏伟(2012)、刘

西国(2015)、黄庆波(2018)等学者认为, 家庭养老是人类社会最古老、最基本的养老方式。其中, 代际支持是家庭养老的重要组成部分。Grundy E.(2005)等国外学者认为, 在内容上, 代际支持可分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与情感交流, 代际经济支持是代际支持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方向上, 代际支持可分为成年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的代际支持(简称向上代际支持)与老年父母为成年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简称为向下代际支持)。Kohli M.(2007)等学者通过研究得出老年人是代际支持的主要提供者结论。林如萍(2012)以中亚社会家庭现状为研究基础, 认为不同于西方, 中亚地区代际支持的主要流向是从成年子女流向老年父母。长期以来, 子女的经济转移支付是我国农村老年人在年老后, 获取经济支持的主要渠道。赵立新(2006)、叶敬忠(2009)等学者认为子女对老人的经济供养是养老保障体系建立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

代际间的经济支持能力与水平, 受各种外在与内在因素的制约。黄庆波(2018)认为, 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的特征显著影响向上的与向下的代际经济支持。Grundy E.(2005)、Aranda MP.(2009)、江克忠(2013)、伊庆春(2014)等学者认为, 年龄较大、有残疾、经济状况较差、丧偶或者无配偶的老年人, 子女给予代际支持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子女的特征, 也会显著地影响向上的代际经济支持。Fingerman(2009)、Giles J(2012)、王宜乐(2014)等学者认为, 已婚的子女、经济能力强、受教育水平高、与父母同居的子女为父母提供代际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更大。Fritzell J(2005)、Kim K(2015)认为, 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已婚或丧偶的老年人, 为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更大, 低收入的老年人, 给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总数较大。Sarkisian N(2008)、Hartnett CS(2013)认为子女的年龄、婚姻、生育、健康、社会经济状况、兄弟姐

[收稿日期] 2020-02-01

[基金项目] 2019年重庆工商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挤入’还是‘挤出’: 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机制与实证研究”(yjscxx2019-101-16)。

[作者简介] 阎茂瑶(1992—), 女, 重庆忠县人, 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应用社会学; 纪杰(1979—), 男, 山东海阳人, 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 应用社会学。

妹数量与居住安排,决定了老年人子女提供的代际经济支持的可能性与数量。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中国的家庭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逐渐从“大家庭”向“小家庭”转变。家庭结构小型化对老年人从子女处获取经济支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新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建立与发展,保障了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所需,改善了他们的财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缓解了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缺失问题的负面影响。Cagan(1956)提出社会保障具有认知效应与教育效应,表现在,一个人被迫参加养老金计划的行为会促使他的子女第一次认识到进行经济供养的重要性,从而增加对老年人的经济供养。夏传玲(2007)认为,社会养老保险增加了老年人的可支配资源,提高了老年人的付出能力,在家庭交换中可参与范围扩大。胡宏伟(2012)、解垚(2015)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释放了老年人养老及医疗的需求,对提高子女经济供养的水平具有积极的作用。然而,另外一部分学者,例如Jensen(2003)、Anette(2006)、范辰辰和李文(2015),却认为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缓解了农村子女的养老负担,“挤出”了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丁志宏(2013)指出,在愈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下,老年人老年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由子女经济供养转变为以养老金作为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养老保险“挤出”了子女的经济供养。胡仕勇(2013)、张川川(2014)、刘一伟(2016)等学者认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存在“挤出”效应。

综合上述文献可以看到,关于社会保障对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研究在理论和经验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综合来看,已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养老保险对代际向上经济支持的影响,只有Leopold(2011)、陈功(2018)等少数学者同时关注代际支持的双向维度,对养老保险与双向维度代际经济支持的研究成果较为缺乏;第二,现有代际支持相关因素分析缺乏对成年子女特征的控制。基于此,本文将利用全国性的微观数据,控制老年人、成年子女特征,考察老年人与成年子女之间的代际支持情况,探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双向维度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效应。以期代际支持的互动以及研究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的图景和认识,为推进统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以及老年人医疗和养老权益保护等现实问题提供决策参考。

3 数据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与2015年随访数据。CHARLS数据是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导,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与北京大学团委共同参与的一项全国范围的家户调查,以我国45岁以上居民为调查对象,从2011年的基线调查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随访调查。调查样本分布全国28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150个县城,450个社区(村),至2015年,已调查了1.24万户家庭,2.3万人。CHARLS数据由个人基本信息,家庭信息,健康状况和功能,医疗保健与保险,工作、退休和养老金,收入、支出与资产,住房情况七部分组成,因其多样且丰富的信息,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选取所在村开展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调查对象有资格参保新农合且调查对象没有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居民,这部分居民为农村户籍人员,属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适保对象且有机会参保;新农保政策规定,只有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才可以领取养老金。探究新农保对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经济支持的影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内容,因此,只有年满60周岁,已符合新农保养老金领取条件的居民,才能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以上述条件为基础,对数据库样本进行筛选。经过筛选与剔除缺乏相关变量的样本,最终选取的样本量527个。

3.2 方法

本文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养老金与代际经济支持之间的关系。

因变量。家庭内部代际间的代际经济支持,在方向上,既有向上的代际经济支持,又有向下的代际经济支持。因此,本研究的因变量指向上的代际经济支持、向下的代际经济支持。并遵循惯例,对向上与向下的经济支持分别取对数。本研究的自变量为新农保养老金,并在回归分析中取对数。父母与子女的个人特征、父母的社会特征,会影响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双向的经济支持。因此,控制父代的个体特征与子女的个体特征对子女与父母之间经济支持的影响,例如性别(男=0,女=1)、年龄(作为连续变量直接进入模型)、婚姻(0=非在婚,1=在婚)、教育水平(0=文盲,1=小学,2=初中及以上)和自评健康状况(0=不健康,1=一般,2=健康)、子女居住距离(0=同市、区、县、村,1=外省、市)、存活子女数(作为连续变量直接进入模型)等变量。同时,父母是否参保社会医疗保险也是影响代际间经济支持的重要变量,控制参保社会医疗保险状态(0=未参保,1=参保)。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分析结果

在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方面,成年子女为老年父母、以及老年父母为成年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比例分别为80.1%、13.7%,代际支持主要从成年子女流向老年人。新型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养老金方面,农村老年人平均每月可以领到70.18元养老金,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较低。

在个人特征方面,所选取的样本中,农村老年人的平均年龄为67.87;在本文中,将“与配偶一起居住、因工作原因未跟配偶一起居住、同居”作为老年人在婚状况,所占比例为68.5%,将“丧偶、离异、分居、从未结婚”作为老年人非在婚状况,所占比例为31.5%;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学历为

小学及以下文化所占比重为 88.8%; 健康状况方面, 自评不健康的比重为 38.3%。

在子女特征方面, 被访者与子女生活在同一个市、区、县、村的比重为 62.6%; 每一位被访农村老年人存活的子女数平均为 4 个; 子女为在婚状态的比重为 88.8%; 子女的文化程度相对于老年人, 有较大的改善, 初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比重为 39.9%; 而子女的收入方面, 年收入在 3 万以下的比重为 68.3%, 被访老年人子女的收入水平较低。在社会特征方面, 被访老年人参保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任一种医疗保险的比重为 96.8%。

4.2 回归分析结果

4.2.1 对向上代际经济支持影响的回归分析。表 1 的回归结果显示,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向上的代际经济支持影响不显著。对农村老年人而言, 养老保险并没有改变子女的经济供养行为。这一研究结论与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 如刘一伟 (2016) 的研究发现, 社会养老保险对子女经济供养老人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 养老保险挤出了城镇子女对老人的经济供养, 但对农

村子女经济供养老人的行为没有显著的影响。从代际交换理论视角分析,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支持具有互惠性。在父母的收入不足以保障其基本生活所需时, 子女处于利他动机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保障父母生活, 而当养老金保障了父母的基本生活所需时, 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动机逐渐由利他动机向交换互惠动机转变, 子女只为父母提供养老金无法保障的那部分的生活所需, 因此, 养老金挤出了子女提供给父母的经济支持。但该观点在本文中却未得到印证, 可能的原因是相比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养老金水平较低。从上文描述分析结果可知, 农村地区老年人每月平均领取的养老金仅为 70.18 元, 远远低于最低生活保障, 其保障水平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所需, 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来源仍旧只能依靠子女的经济支持。父母和子女部分个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方程, 回归结果显示, 子女居住距离和子女数量, 以及父母的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 显著影响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行为。当父母与子女间居住距离扩大时, 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可能性会逐步减小, 这与刘伟兵

表 1 向上和向下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

指标	向上的代际经济支持			向下的代际经济支持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养老金	-0.512	-0.115	-0.201	1.267**	1.267**	1.267**
性别 (女)						
男	0.724**	0.758**	0.722**	0.592**	0.592**	0.592**
年龄	0.088***	0.056**	0.059*	0.609	0.609	0.609
婚姻 (非在婚)						
在婚	-0.113	-0.051	-0.053	1.800	1.800	1.800
受教育水平 (文盲)						
小学	0.770*	0.690	0.704	1.222	1.222	1.222
初中及以上	0.460	0.447	0.447	1.356	1.356	1.356
自评健康 (不健康)						
一般	0.271	0.355	0.332	0.000	0.000	0.000
健康	0.326	0.411	0.380	0.137	0.137	0.137
子女居住距离 (同市、区、县、村)						
外省、市	-	-0.494*	-0.495*	-	0.033	0.033
存活子女数量	-	0.259**	0.238**	-	3.168*	3.168*
子女婚姻状况 (非在婚)						
在婚	-	-0.043	-0.046	-	0.005	0.005
子女学历 (小学及以下)						
初中	-	0.036	0.017	-	0.129	0.129
高中及以上	-	-0.131	-0.131	-	0.050	0.050
子女个人收入水平 (低)						
中	-	0.314	0.340	-	0.025	0.025
高	-	0.560	0.597	-	0.021	0.021
社会医疗保险 (否)						
是	-	-	0.294	-	-	0.492
向下经济支持 (否)						
是	-	-	-0.438	-	-	-
向上经济支持 (否)						
是	-	-	-	-	-	1.697
常量	-4.371**	-3.953*	-3.953*	-4.438***	-4.438***	-4.438***

备注: 上标 “*”, “**”, “***” 分别表示统计结果在 10%, 5%,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2019)认为子女居住距离越远,给予父母代际经济支持越多的结论不同。这可能是因为,外出打工的农村年轻人,在城市中处于边缘群体,收入水平较低,自身经济压力大,从而减少了对父母的代际支持。存活的子女数量越多,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越大。父母年龄越大,得到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数量越多。

4.2.2 对向下代际经济支持影响的回归分析。表 1 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向下的代际经济支持方面,养老金在 5%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的符号为正,其表明新农保与子女经济供养老年人呈显著正相关,即新农保“挤入”了父母对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这一研究结论与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似,如张航空(2011)的研究发现,养老金每增加 1 元,老年人向子女提供代际经济支持的数量就增加 1.20 元。责任伦理者认为老年人只强调自己对后代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在各方面对子女不计回报地付出,当子女在养老方面尽“孝”不到位时则给以宽容,同时在赡养的三个方面(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尽量自立和自己解决,以减轻子女的赡养负担(杨善华,贺常梅,2004)。而当父母的基本生活所需通过养老金得到部分的保障后,出于责任伦理的老年人,为维系与子女之间的感情,会挤出部分人力、物力用于支持子女,相比于没有养老金的父母,有养老金的父母有更多的能力为子女提供支持,因此,养老金强化了父母向子女提供支持的意愿,从而“挤入”了向子女的经济支持。向下代际经济支持受到父母和子女部分特征的显著的影响。存活子女数量,以及父母的性别对父母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的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会分散老年人的资源,使父母为子女提供代际支持的可能性降低,据分析数据所示,农村 60 岁以上老年人,存活子女的平均数为 4 个,子女数越多,父母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越小。与女性老年人相比,男性老年人子女提供代际经济支持的可能性较大。

5 总结与展望

从代际经济支持的方向看,农村老人和子女之间的代际经济支持是双向的,代际经济支持不仅从子女流向父母,还从父母流向子女。并且老年人与子女的部分个人特征与社会特征显著影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经济支持。养老金和代际经济支持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在农村地区,养老金的增加对子女经济供养老年父母无显著性的影响,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养老金会“挤入”父母对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

通过研究发现,在中国农村地区,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仍然是老人养老的主要经济来源,社会养老保险仍未根本性动摇我国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但是,受到家庭结构小型化、子女外出务工、“子代掌权”、“资源下行”的影响,一方面,农村

老年人在家庭内部只能得到最低水平的代际经济支持,农村家庭中老年人的利益被高度压缩;另一方面,农村老年人在子女经济支持较少的情况下,为了巩固与子女的养老契约,保障家庭最低限度资源的支持,却不断地增加了对子女的付出,例如,照看孙子女。家庭养老已无法支撑农村老年人老年生活所需,实现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需要社会养老进行弥补。但我国现行的农村养老金制度还不足以满足农村老人养老的需求,农村老人的养老依旧面临巨大挑战。为缓解农村子女养老压力,保障农村老年人养老福利,实现农村养老保险预期作用的发挥,需要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调整农民缴费和财政补贴的方式,提高农村养老保险保障水平,构建确定以制度养老为主、家庭养老为辅的养老格局。

受到数据的限制,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以下四点不足:第一,本文的控制变量仅仅选择的是父母和子女的部分特征变量,未实现变量的穷尽性;第二,在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子女数通常为 2 个及以上,父母与子女在经济互动过程中存在选择偏好,父母更倾向于为更喜欢的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与父母关系亲密的子女相比于其他子女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意愿更强,因此,将父母与其各个子女的经济来往一一对应,分析社会养老保险对代际之间经济支持的影响,得出的研究结论将更加精确。

[参考文献]

- [1] 张川川,陈斌开. “社会养老”能否替代“家庭养老”?—来自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J]. 经济研究, 2014, 49(11): 102-115.
- [2] 刘伟兵,韩天阔,刘二鹏. 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养老的局部替代研究—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家庭代际支持的影响为例[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4(03): 1-17.
- [3] 刘一伟. 互补还是替代: “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基于城乡差异的分析视角[J]. 公共管理学报, 2016, 13(04): 77-88+156.
- [4] 张航空,孙磊. 代际经济支持、养老金和挤出效应—以上海市为例[J]. 人口与发展, 2011, 17(02): 14-19+62.
- [5] 杨善华,贺常梅. 责任伦理与城市居民的家庭养老—以“北京市老年人需求调查”为例[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1): 71-84.
- [6] 宋璐,左冬梅. 农村老年人医疗支出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 以巢湖地区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10(05): 74-85.
- [7] Lei, X., C. Zhang, and Y. Zhao, 2013. Incentive Problem in China's New Rural Pension Program[J]. Research in Labor Economics, 2013, 37, 181-201.
- [8] Zhu H. Adult Children's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generational Financial Transfers in Urban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6, 2(1): 75-94.